



导 论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世界性的经济不景气卷土重来，国际经济与贸易的高速增长开始受到阻滞。经济增长的“滞胀”愈来愈困扰着西方各国，贸易战愈演愈烈。自由贸易的主张开始受到质疑，而新贸易保护主义渐占上风。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一种既不同于“自由贸易”又区别于“保护贸易”的新的国际贸易理论及政策开始出现。这就是“管理贸易”（Managed Trade 现象。

西方学者称之为“管理贸易”的这一现象所出现的背景是什么？所要研究的主体又是什么？对其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如何？国内外对此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如何？本章在回答这些问题的基础上，着重说明本书的研

究思路和方法，介绍本书的体系框架和内容安排。

1.1 问题的提出

19 世纪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穆勒曾经说过，国际贸易的益处，在于更加有效地利用世界的生产力。^① 各国在开展对外贸易时，也正是为着能够充分、有效配置国内外资源，并从中获得最大利益。在追求最大利益的过程中，各国从所处历史条件和自身经济利益考虑，所采取的贸易政策不尽相同。由于古典的比较利益学说和现代的要素禀赋理论一直在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中占主导地位，因此尽管对国际贸易加以保护的思想一度有取代自由贸易的势头，但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主流思想却始终是西方国家（不管是主张自由贸易的国家还是主张保护贸易的国家）所极力推崇和向往的。从国际贸易发展的历史来看，自由贸易政策与保护贸易政策总是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同时或交替存在。

从贸易理论发展史来看，贸易理论历经重商主义、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等四个阶段。

国际贸易理论可以追溯到 15 世纪末、16 世纪初开始出现的资本主义最初的经济理论——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把货币看成是惟一财富，是衡量一个国家富裕程度的惟一标准，把对外贸易看成是增加财富的惟一源泉，竭力鼓吹国家垄断对外贸易，以达到积累货币财富的目的。重商主义者为政府干预经济和贸易活动提供了一整套理论根据。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初的很长时期中，作为当时几乎所有贸易国家的政府所采纳的经济政策，它对反对封

^① 转引自 [美] 保罗·萨缪尔森 (1978): 《经济学(第 3 版)》(下册)(中译本), 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 第 36 页。

建制度、促进资本主义的最初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重商主义认为增加财富的惟一有效措施是加强国家对经济和贸易活动的干预，国际贸易的商品输出和输入必须保持顺差，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到了 17 世纪末叶，主张政府干预和贸易保护的重商主义就受到了社会的广泛批评。

18 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绝对利益学说与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对重商主义贸易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批评。李嘉图在其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完善了亚当·斯密的绝对利益学说，强调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条件下自由竞争可以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国家应该采取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让“看不见的手”去指挥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则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由于斯密和李嘉图的贸易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被称为“古典贸易理论”，并成为传统贸易理论的核心，以后几乎所有主流贸易理论都是围绕了这个核心所展开的。斯密的绝对利益学说和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侧重于从供给方面来分析国际贸易的原因。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对比较利益学说进行了庸俗化的阐述。他完全抛弃了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而用边际效用价值论和商品价值的供求决定原理来确定国际贸易的商品交换比率，提出相互需求理论。其后，马歇尔开创性地将几何数学方法引入国际贸易的理论分析中，对相互需求理论做了深入的分析，运用其相互需求曲线求出两国进行贸易而产生的均衡贸易条件。但相互需求原理同样没有说明商品交换比率的形成基础，即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比较成本的差异。

20 世纪 30 年代，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运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从表象的商品成本深入到要素禀赋上对古典贸易理论进行了修正，解释了比较成本的来源，在更深层次上论证了国际分工的好处和自由贸易的必要性，并提出各国都应出口那些要

素比较密集即禀赋比较丰富的商品。该理论被称为要素禀赋理论，也称为“HO 定理”，在贸易学说史上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并成为 20 世纪贸易理论的基石。其后的保罗·萨缪尔森又运用数学方法推导证明了俄林的理论，提出了在一定条件下“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萨缪尔森，1941），因此“HO 定理”又称为“HOS 定理”。

尽管 HO 定理的出现使西方贸易理论界受到很大震动，但随着战后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结构变化，HO 定理显现出了其局限性。第一，按照该理论，国际贸易应主要发生在要素禀赋和需求格局不同的国家之间，差异越大的国家进行国际贸易获利也越大，这就无法解释当今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密切且迅速发展的贸易关系及产业内贸易的实际情况；第二，该理论与古典贸易理论一样假定国际贸易发生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条件下，实际上它所假定的完全竞争的市场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第三，该理论尽管不像古典贸易理论那样认为劳动是惟一的生产要素，但同样假定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

1953 年，美国经济家里昂惕夫（W. Leontief）按照 HO 定理的结论，首次运用投入产出法，选择美国为实例进行了验证。根据 HO 定理，美国作为一个拥有较多资本和较少劳动力的国家，应该输出资本密集型产品，输入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是，里昂惕夫通过对美国 200 多个产业，特别是其中直接进行对外贸易的产业的实证研究，发现美国的与进口商品竞争的国内产品比起出口产品来说是更加资本密集型的，这显然和 HO 定理的结论是相矛盾的。后来，里昂惕夫又对 1951 年美国对外贸易结构进行了检验，得到的仍是这个结果。此即“里昂惕夫之谜”。

“里昂惕夫之谜”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极大兴趣，对它的解释也纷纷出现，并导致后来的几十年间，不断出现一些新的贸易理论。这些贸易理论或对传统贸易理论进行解释，或对战后发

达国家间以及相似产品间的国际贸易新现象进行解释，包括雷布钦斯基定理（T. Rybczynski, 1955）、克拉维斯可获得性说（I. Kravis, 1956）、技术差距论（M. A. Posner, 1959）、人力技能要素论（D. Keesing, 1966）、制成品贸易周期说（R. Vernon, 1966）等等。然而，这些贸易理论尽管有其鲜明的特点，但大多没有形成一整套理论体系，只能作为古典贸易理论的补充。^①

管理贸易理论的出现弥补了这个缺憾。首先，管理贸易理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贸易理论，突破了传统贸易理论的完全竞争市场条件假设；其次，管理贸易理论并不限于解释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国家间的贸易关系，突破了传统贸易理论的要素

如前所述，贸易理论大体分为自由贸易论与保护贸易论两类。而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正统思想却始终是各国所极力推崇和向往的故本章所回顾的传统贸易理论主要是以主张自由贸易的理论来串联。

从保护贸易理论来看在重商主义之后，当大卫·李嘉图提出比较利益学说时，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赞同这一学说。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低于英国以及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只能依赖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那些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对此学说提出了批评。其中最著名的是德国经济学家弗利德里希·李斯特。李斯特受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汉密尔顿（A. Hamilton, 1791）向国会递交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及其实施成功的启发，以生产力理论来代替英国古典学派的价值理论，并从生产力理论提出了经济发展阶段论，又以此为基础主张国家应采取保护的、防御性的贸易政策以保护相对后进国家的幼稚工业（李斯特，1841）。此后，在俄林提出要素禀赋理论两三年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于对 1929~1933 年世界性经济大危机的极大关注，完全改变了其原先推崇的自由经济思想，并根据“有效需求原则”，主张国家干预对外经济。在贸易理论上突出表现为一国要大力发展外贸，并千方百计要使对外贸易顺差，以保持国内的充分就业，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在凯恩斯的理论中，虽没有提出实行保护贸易政策，但他认为只有在能够获得对外贸易顺差的情况下，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才是适当的。换句话说，如果对外贸易不能在自由贸易条件下保证贸易顺差，那么实行保护贸易政策才是达到贸易顺差的有力保证（凯恩斯，1936）。凯恩斯的这种比以往更具隐蔽性和侵略性的贸易理论几乎成了 20 世纪 70 年代新贸易保护主义产生的理论依据。尽管如此，战后整个国际贸易的发展，又几乎始终处于一个追求“自由贸易”这个最佳贸易偏好的状态中。

禀赋和需求格局不同假设；第三，更重要的是，管理贸易既不是自由贸易，也不是保护贸易，而兼有两者特点。战后的一段时期，尽管一些国家利用 GATT 的“灰色区域”采取了一定的保护贸易措施，但各国政府仍高举自由贸易大旗，在不同场合表明本国对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的积极态度，而对保护贸易惟恐避让不及或否认他国对本国的新贸易保护措施“指控”。管理贸易理论的提出，使这些国家找到了一个在贸易自由化外衣下的政府干预、管理贸易的理论依据。于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先后公开采取了管理贸易政策，并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与此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出于保护和发展民族经济的需要，也将管理贸易理论运用至本国贸易政策。因此，管理贸易理论更为贴近现实。深入、详细地分析管理贸易现象是本论文的主要任务。

本书的研究动机基于以下的考虑：

第一，尽管管理贸易理论已成为国际贸易新理论之一，在国外各种文献中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但是从已有文献来看，管理贸易理论尚未成熟，对管理贸易理论的认识也不尽一致。本书试图从国际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管理贸易的产生机理和理论内涵。

第二，西方学者关于管理贸易的研究大多以工业发达国家为背景而展开的，几乎没有涉及发展中国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的研究基本上还侧重于一般性的评述。本书试图对发展中国家管理贸易现象作一个描述。

第三，我国加入 WTO 后，如何解读管理贸易理论及应对国际上一些国家的管理贸易政策，并在 WTO 框架下制定我国对外贸易的适应性对策，这是本书的又一立意所在。

1.2 文献回顾

战后贸易理论最突出的发展是出现了两个新的重要理论，且在不同的层面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一个理论是以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 Krugman）和赫尔普曼（E. Helpman）等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New-Trade Theory）^①；另一个理论就是“管理贸易理论（Managed Trade Theory）”。其中，管理贸易由 20 世纪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的国际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理论演变而来。

战后，随着美国与西欧、日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相互融合和渗透，一些西方学者开始研究国际相互依存关系。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柏（Richard Cooper, 1968）^②首次提出，国际相互依存对各国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并使各国为达到各自的经济目标的决策过程减缓了；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环境下，应加强国际合作，以缓和国际规则与本国自主权的矛盾和冲突。库柏（1969）^③还建立了一个具有固定汇率和价格、经济相互依存的两国模型，分析了相互依存经济中的政策调整问题。

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的 J. 奈伊与现为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教授的 R. 基欧汉（Joseph S. Nye, and Robert Keo-

有关新贸易理论的讨论放在本书的第 5 章。

^② Cooper, Richard. 1968, *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 Economic Policy in the Atlantic Community*, New York: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相互依存”又译作“相互依赖”。

^③ Cooper, Richard, 1969, “Macroeconomic Policy Adjustments in Interdependent Economi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这种相互依存战略格局中，美国、西欧和日本等“每个国家的决策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决策和实施结果。每一国政府在制定它自己的经济政策时，不得不考虑其他国家的行动以及可能作出的反应；其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其他国家的行动和反应。在这样的形势下，只有通过国际协调才能避免政策竞争，取得最佳效果。”^①

这时期，法国两位前总统的观点和国际上有关国际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的讨论成了管理贸易的最初基础。

追根溯源，“管理贸易”一词由美国学者 J. E. 斯贝茹博士首次提出。J. E. 斯贝茹（1984）^②认为，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两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不确定性和美国贸易逆差的扩大等成为新贸易保护主义高涨的原因，使许多决策者和分析家不再讨论自由贸易制度，而开始讨论公平贸易或有管理的贸易制度问题，管理贸易由此产生并发展。或许限于当时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局限，及受当时决策者和分析家对管理贸易的认识并不一致的影响，尽管 J. E. 斯贝茹简要分析了管理贸易产生的原因，但并未明确、清晰界定管理贸易的范畴和特征，也未提出具体、完整的管理贸易模式和手段。

此后，有关管理贸易的讨论不断涌现，既有赞同者，也不乏认为管理贸易会阻碍贸易自由化进程，甚至降低预期福利者。

一、赞同管理贸易的西方学者的文献回顾

世界上第一部较为系统论述管理贸易的专著是美国经济学家 Raymond J. Waldmann 于 1986 年出版的《管理贸易：国家间新

〔美〕罗伯特·吉尔平（1987）：《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73 页。

②〔美〕J. E. 斯贝茹（1984）：《国际经济关系学》（中译本），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91～131 页。该书第一版出版于 1977 年，第二版出版于 1980 年。中译本根据该书第三版译出。

竞争》。^① Waldmann 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较全面地阐述了管理贸易现象，认为管理贸易不同于任何传统的国际贸易模式；管理贸易模式既不是依赖于自由市场机制的自由贸易模式，也不是政府出于保护国内工业的目的采取的纯粹的保护贸易模式，而是受政府控制和指导的贸易模式。Waldmann 还比较和分析了传统的贸易管理模式和管理贸易模式的不同。传统的政府对贸易管理和控制模式主要是，出于保证国内需要、惩罚贸易伙伴或国家安全目的的贸易禁运；运用禁止进口、配额、关税等措施达到限制进口的目的。这些传统的管理和控制贸易的模式总的来说还属于一国所固有的主权，是一国国内的独立性事务。而管理贸易模式主要通过出口资助、国家间双边有秩序的销售安排（OMAs）或自愿出口限制（VERs）谈判、自由贸易区、商品分类协议等达到其目的。贸易日益受到政治、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而被政府管理。而经济学家 Lawrence B. Krause (1992)^② 认为由于战后技术更新速度加快，规模经济、FDI 的扩展等原因，贸易不仅受政府的控制，更多的可能还会受厂商的影响和控制。^③ 也正是由于政府指导和厂商行为对贸易的影响，管理贸易会促进市场的有序化，而不会像许多经济学家所指责的那样，管理贸易会导致市场的僵化。由此可见，Krause 不但推崇管理贸易政策，而且将厂商行为引入到管理贸易的分析中来。如果将厂

① Waldmann, Raymond John, 1986, "Managed Trade: The New Competition Between Nations", *Harper Information*.

② Krause, Lawrence B., 1992, "Managed Trade: The Regime of Today and Tomorrow",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Vol. 3, No. 2, pp. 301-313.

③ Krause 认为，在新自由理论的理想世界里，商品和服务是在完全竞争市场中交易，要素也在竞争市场中获得，因此商品以边际成本定价。但是绝大多数国际贸易并非如此。事实上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是在向下倾斜的平均成本点上生产和定价。定价是公司的战略决策，因此更多的贸易可能被公司管理和控制着。

后以高技术产业为例，分析了管理贸易的政策原因和基本原理，并基于高技术产业的溢出利益 (Spillover Benefits) 证明了管理贸易政策的正当性，进而提出了鉴于 GATT 运行得并不有力，美国政府在贸易“战术”上应采取竞争政策、反倾销法、公平贸易等管理贸易政策的建议。Tyson 还认为，通过自愿进口扩展 (VIEs) 的管理贸易措施会增加市场中的竞争者数量。值得注意的是，也许顾虑到一些学者（比如居于主流的自由贸易拥护者）的误解或反对，尽管 Tyson 在该文中明确赞成采取管理贸易政策，但此后在提及管理贸易政策时却既低调又谨慎。这可从她 1993 年出版的著作^①中得到印证。Tyson 在该书中选取电讯产业、电子产业、半导体产业、商用飞机等高技术产业较为全面地分析了美国的贸易政策，显然是对前篇论文的深化阐述，但通篇未明确提出管理贸易的政策建议。

Tyson 关于管理贸易是一种贸易政策而不是贸易理论的观点得到了 Robert Reich (1989)^② 的赞同。Robert Reich 肯定管理贸易政策的有效性的同时，又进一步指出了 Tyson 的观点有矛盾之处。比如，Tyson 一方面认为管理贸易是一种能达到某种规则体系 (A System of Rules) 的短期战术，另一方面又强调管理贸易也会导致在国家间的零和博弈中的“动态学习效应 (Dynamic Learning Effects)”。Reich 指出，既然管理贸易会导致“动态学习效应”，那么它应该是一种长期的解决方案。

① 具体参见 [美] 罗拉·D'安生·迪森 (1993): 《鹿死谁手——高技术产业中的贸易冲突》(中译本)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6 年版。

有关 Dixit、Baldwin、Reich 等人对 Tyson 论文的评述均见 Lawrence, Robert Z. and Charles Schultze, eds., 1990, *An American Trade Strategy: Options for the 1990s*,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Susan W. Liebeler 和 Michael S. Knoll (1990)^① 则进一步从贸易政策的角度，以美日贸易摩擦为背景，介绍了管理贸易政策的讨论进展，分析了管理贸易政策可能的效果。比如，ACTPN (The Advisory Committee for Trade Policy and Negotiations) 认为管理贸易政策应该是，美国谈判者首先应计算出美国国内那些具有竞争性、无壁垒市场的份额，然后用政策引导日本在这些市场份额中进行生产。美国前国务卿 Henry Kissinger 和 Cyrus Vance 认为管理贸易政策实质是，美国和日本应该达成一个双方都满意的总的贸易平衡协议，其主要内容就是日本应同意在某些产业对美国的减少出口或增加进口，以及减少或增加的量。涉案产业应该是那些日本公司能在美国市场获得最大垄断利润从而最可能损害美国消费者利益的产业。Liebeler 和 Knoll 则指出管理贸易政策是市场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贸易政策，在这种市场结构中，管理贸易的“利润转移 (Profit Shifting)”或“租 (Rents)”的效果，使其成为国家政策的手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政府可以采取管理贸易政策手段将这种“租”从他国的卖方垄断产业转移到本国。Liebeler 和 Knoll 进一步得出结论，在理论上，管理贸易使得政府干预以获得国家利益有了理论依据；但在实践上，政策制定者将发现要保持决策的独立性比较困难，因为难以确定什么时候采取管理贸易政策，或者采取什么形式的管理贸易手段使得政府干预能获得国家利益，而不仅仅是受到影响的产业获益。

从上述观点可见，这些经济学家和学者在阐述管理贸易政策时，有意无意间已开始运用产业组织等理论进行分析。这一现象

^① Liebeler, Susan W. . and Michael S. Knoll, 1990, "The Perils of Managed Trade", *Policy Analysis*, Washington, D.C. : the Cato Institute, No. 138, August 29.

表明，经过近十年的讨论，源自于实践而提出的管理贸易命题已突破政策层面分析的局限而开始向理论化迈进。

管理贸易真正作为一种贸易理论而被规范论证应该归功于著名经济学家 Kyle Bagwell 和 Robert W. Staiger (1990)。^① Bagwell 和 Staiger 明确指出管理贸易不仅是一种贸易政策，也是一种贸易理论，并通过建立 Bagwell-Staiger 模型把管理贸易理论一般化。而在管理贸易政策的分析方面，他们认为战后工业发达国家的管理贸易政策受两个趋势的控制，一是 GATT 框架下有关关税减让的多边谈判；二是在工业发达国家经济日益一体化过程中的“特别保护”趋势。这种“特别保护”包括有秩序的销售安排 (OMAs)、自愿出口限制 (VERs) 以及低基线关税 (Low Baseline Tariffs) 措施等。故管理贸易通常又被用来描述当代国际贸易环境。若干年后，Robert W. Staiger (1994)^② 又将管理贸易的“特别保护”形式从 3 种增加到 4 种，即增加了自愿进口扩展 (VIEs) 形式，并进一步指出，管理贸易是一种利用 GATT “灰色区域”的“特别保护”，其功能就是所涉国家利用达成的协议来达到行政共享和寻租的目的。这种“特别保护”的期限取决于被保护的产业（一般为进口竞争性产业）在享受到“特别保护”后调整到足以应付来自进口竞争的时限。这就存在一种政府与进口竞争性产业间的博弈。Matsuyama (1990) 曾经

见 Bagwell, Kyle, and Robert W. Staiger, 1990, “A Theory of Managed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0, pp. 779-795 该文建立了一个管理贸易的博弈模型。首先在自由贸易、两个国家、单部门假定条件下提出一个局部均衡的基本模型；然后分析在两国均采取配额和关税手段后的静态纳什均衡博弈模型；在静态模型基础上又扩展分析保护的动态模型。对该模型的全面介绍可见本书第四章。

^② Staiger, Robert W., 1994,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Institutions for Trade Policy”, *NBER Working Paper*, No. 4962.

演示过这种博弈过程^①：在 t 时期，政府的选择有贸易自由化和贸易的特别保护两种。如果政府选择自由化，则博弈结束。如果政府选择临时的特别保护，则进口竞争性产业就须选择是否要为 $t+1$ 时期的自由化做好“准备”。这种博弈在以后的时期会不断重复直到政府选择自由化，博弈结束。问题在于，如果政府发现自己在 t 时期提供了临时的特别保护，而进口竞争性产业并未选择为 $t+1$ 时期的自由化做好“准备”，那么，谁能确保政府不会在 $t+1$ 时期继续选择临时的特别保护呢？而且，如果该产业相信若在 t 时期不选择“准备”，政府在 $t+1$ 时期仍会继续选择临时的特别保护时，则该产业将永远不会选择“准备”，政府临时的特别保护计划也就不再“临时”了。

Bagwell 和 Staiger 对管理贸易的理论分析佐证了 Krause (1992) 的观点，即管理贸易不仅受政府的指导和控制，还受厂商（利益集团）行为的影响。而且，进口竞争性产业这一利益集团从自身利益的角度考虑，对贸易政策的偏好更多的是倾向贸易的特别保护。我们可从中得出结论，管理贸易具有长期存在的趋势。但是，Bagwell 和 Staiger 建立的模型及对管理贸易的理论推导尽管精巧，但并未进行检验。

Thomas J. Prusa 和 Susan Skeath (2002)^② 将 Bagwell-Staiger 模型的两个假定扩展成四个假定，采用案例分析法论证了管理贸易理论。他们研究了 1980~1998 年全世界反倾销案例，以测定和解释一国为什么采取管理贸易政策。作者认为现代商业政策已经明显地受到全球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开放运动的影响，关

① 转引自 Staiger, Robert W. (1994)。原文可参见 Matsuyama, k. (1990), Perfect Equilibria in a Trade Liberalization Gam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② Prusa, Thomas J., and Susan Skeath, 2002, "Modern Commercial Policy: Managed Trade or Retaliation?", *Wellesley College Working Paper*, Massachusetts: Wellesley College.

税和配额曾经被政策制定者广泛运用，而现在反倾销和反补贴（尤其是反倾销）等手段却成为 WTO 框架下合法的也是最重要的管理贸易手段。在该文中，作者比较了 4 个主要的假定，其中“大厂商 (Big Supplier)”和“进口激增 (Big Change in Imports)”两个假定来自于 Bagwell-Staiger 模型，另两个假定是“针尖对麦芒 (Tit-for-Tat)”和“俱乐部效应 (Club Effect)”。Prusa 和 Skeath 证明了一国之所以采取反倾销这种管理贸易手段是受到“大厂商”（或者代表进口竞争性产业的利益集团）的影响的，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反倾销是用来抵御进口激增的厂商的。Prusa 和 Skeath 还证明了反倾销手段的运用是为了阻止反倾销在以后的运用，或者说是使用了反倾销手段的贸易伙伴的报复，而且这种“针尖对麦芒”式的报复会形成一种“俱乐部效应”。该文的结论否定了以往将反倾销行为的增多仅仅解释为源于不公平贸易增加，或者说反倾销行为最初是用来对付不公平贸易的观点。我们从中还可得知，在工业发达国家，表面上看反倾销等管理贸易手段是用来对付不公平贸易，实质上是利益集团维护集团利益、政府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政策工具。而这种“自利性”政策工具的广泛使用又会促进世界范围的公平贸易。

实际上，一些学者早先就意识到了管理贸易现象的利益冲突本质，故而从政治的角度分析了管理贸易政策。美国学者 Robert Kuttner (1989a)^① 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赞成 Tyson 关于美国政府应在半导体等高技术产业部门实行管理贸易的观

^① Robert Kuttner 是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的创办人。该评述作于 1989 年的研讨会上，成书于 1990 年。详见 Lawrence, Robert Z., and Charles Schultze, eds. 1990, *An American Trade Strategy: Options for the 1990s*,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点。Kuttner (1989b)^① 又从世界经济体系的演变、国家利益和政治的角度，并以纺织品、钢材、半导体为例分析了管理贸易和经济主权关系。他指出，现实中是不存在所谓“最优”的“自由贸易”的，只有“次优”的“较自由的贸易”；管理贸易就是现实世界实际运行的“次优”贸易模式。他提醒道，不同的国家会采用不同的规则，如果美国政府在自由主义的世界中继续执着地抱有美国霸权的幻想，只会削弱本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秩序。因此出于国家和全球利益，应该采取管理贸易政策，以促进竞争、创新和较自由的贸易。

以上关于管理贸易理论和政策的研究均是以美国或日本等最发达西方工业国家为背景的。加拿大经济学家 Jill E. Hobbs 和 William A. Kerr (2000)^② 建立了一个在某产业领域为生产和贸易的小国如何应对管理贸易的模型。他们以加拿大特种牲畜产业为例，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的范畴和分析方法，分析并提出了小国在产品出口起始阶段，政府应采取管理贸易政策进行有效干预的论点。作者认为，作为一个特种牲畜产业发展较弱的小国，应重视特种牲畜产品的多样化和国际市场的开拓，以分摊产业发展的风险。达到这个目标有两个约束：小国组织国际交易的高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和监控/执行成本）；在现有国际贸易格局下的高进入成本。要达到这个目标，单靠该产业个别企业是比较困难的，应发挥产业协

① Kuttner, Robert, 1989, *Managed Trade and Economic Sovereignty*, Washington, D. C.: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② Hobbs, Jill E. . and William A. Kerr, 2000, *Managed Trade in Non-Traditional Products: Emerging Issues for Canada's Specialized Livestock Sectors, Prepared for:* The CATRN Invited Paper Session at Canadia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Society Meetings, Vancouver, June 1—3. 该文认为加拿大在特种牲畜产品多样化和国际市场开拓方面是一个小国。